

默会知识论视野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

——论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波兰尼立足于默会知识论对斯诺问题作了独特的回应, 实现了对实证主义者和诠释学者、新康德主义者的双重超越, 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假想的鸿沟, 确立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但是, 连续性不排除根本性的差异, 在他的晚年, 波兰尼在连续性的框架之中, 探讨了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区别。作者认为, 波兰尼的这项研究, 体现了参与者视角的主导性、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以及对海德格尔的在世思想的建设性运用等理论特点。

关键词: 默会知识论; 科学和人文; 连续性和区别

中图分类号: B561.5

文献标识码 A

科学和人文、事实和价值的分裂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英国作家C. P. 斯诺把这种分裂表述为“两种文化”的对立^[1]。“斯诺问题”在哲学上的表现之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 实证主义者和诠释学者、新康德主义者针锋相对, 构成了的对立的两极。本文试图阐明: 立足于其默会的、个体的知识论 (theory of tacit, personal knowledge, 默会知识又译意会知识, 个体知识又译个人知识), 匈裔英籍的思想家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 对斯诺问题作出了独特的回应, 实现了对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新康德主义的双重超越。

1 假想的鸿沟

波兰尼和斯诺一样, 对科学和文化的其他部门之间的隔阂表示不满。但是, 他认为, 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鸿沟, 而只是一个假想的鸿沟 (supposed gap)。

波兰尼认为, 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 根源于一种特定的科学观。它发端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 经过启蒙运动的推波助澜, 已成为人们看待科学和知识的主导性观点, 并在现代实证主义那里获得了其典型的表达。在波兰尼看来, 实证主义科学观以客观主义、对完全明确知识的执迷和还原论为基本特征。

客观主义强调科学的超然品格 (scientific detachment), 标举科学的非个体 (impersonal) 特征, 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有个体性的成份, 都被视为有悖于客观主义知识理想的否定性因素, 如果难以彻底根绝的话, 也应该尽量克服、减少。

和客观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 (the ideal of wholly explicit knowledge)。逻辑实证主义最充分地体现了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 把科学等同于一个能够形式化的明确命题的集合, 并把对科学理论的结构作逻辑分析视为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

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第三个因素是还原论。波兰尼认为, 立足于机械主义的世界观, 近代心灵的一个基本倾向, 是力图用物理、化学的规律来说明一切现象。拉普拉斯式的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的理想是还原论的极端表现, 另外, 还原论还突出地体现在各种对人类

事务的自然主义的说明之中，象弗洛伊德将道德归结为欲望的合理化，行为主义撇开人类的意向来理解人的活动等等。

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对科学的这种实证主义的理解，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和社会，关于人的研究必然会产生各种反常的情形，甚至陷于荒谬的境地。比如，神经生理学家否定意识的存在^{[2] (P42)}，社会学家宣称社会学是非伦理的(un-ethical)。¹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伦理陈述的本性的学说。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只有两类陈述，即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是具有认知意义的，因而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伦理陈述既非分析陈述，亦非综合陈述，所以没有认知的、科学的意义。当然，它们具有情感方面的意义，在人类的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与知识无关，属于“非科学的”范畴。波兰尼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人和人类事务，我们很难避免“人的概念的败坏”^{[3] (P25)}，或者把人归结为一副无知觉的自动装置，或者把人还原为一束欲望，或者把人视为一种受现存的权力和利益支配的被动的存在，如此等等。人作为有知觉的、明智的、道德上负责任的存在，必然落在科学的范围之外。任何试图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的道德责任和其他文化责任的努力，都必然难逃“非科学”的命运。也就是说，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蕴涵了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虽然科学的统一是几代实证主义者的一贯追求，但是，在波兰尼看来，在对科学的客观主义的、还原论的理解之下，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如果说，在实证主义者那里，这道鸿沟还是隐含的，那么，“脱离主义者”(secessionists)则公然地宣示了这一鸿沟的存在。柯林武德用“脱离主义运动”这个术语来概括包括诠释学者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在内的强调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历史文化科学之异质性的思想倾向。“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哲学运动，主张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必须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运动很快就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潮。在德国，这个运动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和赫尔德，在意大利，它的根源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维柯。在英国，柯林武德极力主张他所谓的史学从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脱离’出来，他的著作使这一主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 (P72)} 通过强调人文科学的独特性以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脱离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的纲领提出了质难，然而，讽刺的是，如下文将要阐明的那样，当脱离主义者试图在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时，他们却分有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简言之，脱离主义者所主张的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二分法，是立足于对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理解之上的。

总之，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鸿沟，无论它是被内隐地蕴涵的，还是被明确地宣示的，其根源在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如果我们不接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我们就不会被这一鸿沟所困扰，在此意义上，这只是一个假想的鸿沟。因此，克服这一假想的鸿沟的关键，在于挑战、质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知识观。这正是波兰尼的思路。波兰尼说，“通过修正我们的科学知识观，我们就可以开始弥补在科学和我们对作为有知觉的和负责任的存在我们自己的理解之间假想的断裂。”^{[3] (P28)}

2 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修正

波兰尼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它不能为我们提供一幅关于科学的真实图景。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知识观的批判，构成了波兰尼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波兰尼认为，客观主义关于科学的超然理想，根本上是一个神话。他用个体知识论来挑战客观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认识者的参与（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knower）不仅不是需要加以克服的缺陷，也不是什么心理的副产品，而是科学知识的逻辑上不可或缺的因素。科学家出身的波兰尼，立足于科学研究和科学史上的大量事实，指出个体的参与普遍地存在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学科之中，更不用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了。他的个体知识论深入地讨论了判断力、评价、想象力、直觉、理智的激情、信念、担当（commitment）、良知等科学研究中的个体性的协同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波兰尼强调个体性的参与之于科学研究的不可或缺性，不是要把科学知识主观化，他对个体的（the personal）和主观的（the subjective）作了严格的区分。和主观的东西之局限于一己的私人的感受不同，个体的参与“是一个主张普遍有效性的负责的行动。在与一种隐蔽的实在建立联系的意义上，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客观的。”^{[5] (P7)} 个体知识不是主观知识，个体知识是个体的东西与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统一，它是认识者以高度的责任心，带着普遍的意图（universal intent），在接触外界实在的基础上获得的知识。笔者以为，为了准确地把握波兰尼的立场，有必要对客观性的概念作一番讨论。事实上，这里牵涉到客观性的三种涵义：1、作为普遍有效性的客观性、2、作为外部实在之独立存在的客观性、3、作为超然于个体性因素的客观性。显然，波兰尼所反对的客观主义，指的是客观性的第三种涵义，即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强调科学的超然品格的知识理想。但是，个体知识论并不反对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的客观性。个体知识论在强调个体性介入之重要性的同时，依然保持着一个普遍的、外在的维度。个体知识论体现了一种将知识的普遍的、外在的维度置于其真实的语境，即个体介入的语境之中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它和“情景化的理性”（situated reason）的概念在结构上颇有相似之处。用普特南的话来说，就理性不能在具体的语言游戏之外被发现而言，它是内在的，就理性作为我们批判所有行为和建制的范导的理念而言，它是超越的。^{[6] (P288)}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命题和规范所主张的有效性是超越时空的，但是，在每一个现实的情形中，这种主张又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在此时此地被提出来的。^{[7] (P139)} 情景化的理性的概念试图在语境性和普遍性、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个体知识的概念在试图保持这种平衡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普遍性、超越性置身其中的语境性、内在性和个体性的关联。

科学研究和日常认识中的个体性协同因素往往是一些难以明确表述的心灵的默会能力。对认识的默会维度的揭示，否弃了实证主义关于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波兰尼指出：“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象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如果我们把第一类称作明确知识，把第二类称作默会知识，我们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的明确知识是正确的。”^{[4] (P12)} 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各种情形中，“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能够言说的多”（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 这一事实,证明了默会知识的存在。但是,波兰尼不只满足于证明默会知识的存在,他还有一个更强的主张。在他看来,心灵的默会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前语言的层次上,还是在名言文化 (articulate culture) 的范围内,心灵的默会能力代表了人获得和拥有知识的终极能力。他说:“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的。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2] (P144)}显然,对默会维度优先性的强调和实证主义对完全明确知识的执迷是正相反对的。

对默会认识的结构分析被公认为是波兰尼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波兰尼认为,默会认识的结构可以描述为一个三项组合:“第一,辅助的各细节,第二,集中的目标,第三,把第一项和第二项联结起来的认识者。”^{[8] (P27-43)}认识者对第二项的认识,是通过关注它 (attend to) 而获得的,而对第一项的认识,则是通过依赖于 (rely on) 它而获得的,目的是为了关注第二项。认识者对第二项拥有集中意识,同时对第一项拥有辅助意识。通过一个整合的行动,认识者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from-to的关系。波兰尼指出,人的身体在世界上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即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把我们的身体视为一个外在对象,而要认识其他对象,则必须依赖于对我们身体的各种机能的意识,也就是说,对我们身体的意识,总是一种辅助意识,目的是为了认识其他对象。波兰尼从这一点推扩开去,把它上升为一个普遍的命题。“我们因而可以认为,通过关注其他东西而获得的对某物的认识,和我们通过寓居于身体之中而获得的关于身体的知识是一致的。”^{[9] (P142)}也就是说,当我们依赖于关于某物的知识,而关注其他东西时,正如我们依赖于身体而认识他物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将其纳入我们的身体之中——或者把我们的身体延长以将之包含在内——这样,我们就寓居于其中了。”^{[10] (P16)}这就是波兰尼的“通过寓居而认识 (knowing by indwelling)”的著名命题:为了达到集中的整合,我们必须对诸细节拥有辅助意识,而对细节拥有辅助意识以关注由细节联合构成的综合体,就是寓居于细节之中。不难看出,通过寓居而认识这个命题和狄尔泰的强调“理解” (Verstehen) 诠释学思想颇有相通之处。^{[11] (P109-135)}波兰尼承认这层联系,但他进而指出,他的结论主要来自对自然科学的分析,而这正是狄尔泰的诠释学所欠缺的。

“显然,通过寓居而获得知识是和狄尔泰和存在主义相联系的,但是,将其扩展到自然科学是和这些哲学相反的。”³

在此,考察一下波兰尼如何在默会知识论的基础上阐释理解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 这个概念是饶有兴味的。首先,波兰尼认为,“理解”这个概念囊括了人的各种默会能力。理解被界定为一种弄懂 (make sense of) 我们的经验,重组我们的经验,以期实现对它的理智的控制的能力。如上所述,默会认识被认为是人类获得和持有知识的终极的能力,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理解。波兰尼指出,理解,“在我看来,是一种作为认识的核心行动的能力。因为,理解对于任何的认识过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是对任何这类行动的终极的裁决。未被理解的东西不能说是已被认识了。”^{[9] (P120)}其次,在波兰尼看来,“默会认识的结构最清楚地展现在理解的行动中。它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把分离的各部分把握为一个综合的整体。”^{[4] (P28)}在理解活动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核心的认识论关系。为理解整体,我们必须理解部分,同时,我们对部分的理解又是

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对部分的理解不同于我们对整体的理解。整体是我们集中关注的对象，而对部分我们只有辅助的意识。笔者认为，默会认识论对理解活动中部分和整体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所谓“诠释学循环”的问题。第三，波兰尼的理解概念带有浓厚的形上学的意味，含有明确的挑战实证主义的意向。立足于实在论的立场，波兰尼把理解界定为探求现象背后的隐蔽的实在的努力，这种实在将会以我们尚未思及甚至无法预测的方式展现自身。

这就牵涉到了默会认识的本体论的方面，进而牵涉到波兰尼用以取代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层级化实在的本体论。波兰尼认为，在理解的结构和作为认识对象的综合体的结构之间有一种对应性。他说：“（1）对综合体的默会认识依赖于我们对其细节的意识，以关注该综合体；（2）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细节上去，那么，细节的这一功能就被取消了，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所关注的综合体了。这一现象在本体论上的对应物是，（1）支配综合体的诸原理要发生作用，得依赖于支配构成综合体的诸细节自身的规律。（2）同时，支配细节自身的规律无法说明由它们构成的更高的存在体的组织原理。”^{[10]（P34）}在此，默会认识的两个项目相当于实在的两个层次。波兰尼把两个层次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推广到整个宇宙。在他看来，宇宙是由不同的层级构成的。最低的层级是无机的自然，上面是植物性的生命，再上面是动物的知觉，之后是有意识的行为和理智的行动，构成这个等级序列的最高层的是人类的文化。波兰尼认为，“每一个层次都受到双重的支配。首先受到作用于它的各种因子的规律的支配，其次，受到作用于由各种因子所构成的综合体的规律的支配。”^{[10]（P36）}一方面，构成较低层次的诸细节的规律，无法说明较高层次（综合体）的作用。另一方面，较高层次的运作必须依赖于支配诸细节自身的较低层次的规律。因此，较低层次对较高层次构成了限制，它决定较高层次规律成功运作的条件，同时，它也能说明其失败的原因。层级化实在的本体论表明，实证主义的还原论的理论策略是站不住脚的。物理、化学的规律不能充分说明生命现象，人类高级的文化活动，比如道德生活，不能化约为人的低级的机能。

如上所述，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假想的鸿沟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基础之上的。波兰尼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和层级化实在的本体论蕴涵了对一种科学的崭新的理解。在波兰尼看来，在人的研究中，只有通过深度的寓居，置作为认识者的我们与作为认识对象的人于同一境地，分有其思想情感，如此这般，才能真正地把握人和社会。因此，人作为一种有知觉的、理智的、道德上负责任的存在，虽然处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范围之外，却能在这种新的科学观之下得到兑现。波兰尼自信地说，这种新的科学观，“开启了通向人格的大门，这种人格具有完整的道德、宗教和艺术的面貌，而且是历史意识、政治和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因此，通过扩展科学研究，它把我们直接引向了人的有知觉的、创造性的和负责任的生命。”^{[9]（P96）}这一点，在波兰尼对脱离主义者的批判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3 对脱离主义者的批评

如上所述，脱离主义者的基本主张是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史学）之间的鸿沟。波兰尼对脱离主义的主张作了明确的回应。按照笔者的梳理，他和脱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回合的往复辨难。

脱离主义者关于史学和自然科学分离的第一组论据是：历史学家研究行动，而科学家则研究事件；人类行动牵涉到责任，因此历史学家要作道德判断，而科学家则不作价值判断；历史学家必须重新体验其研究对象的行动，或寓居于其中，而科学家则不必如此。

对于波兰尼来说，把史学从自然科学中分离出去的这些理由并不能成立。首先，波兰尼援用动物心理学为例，来拒斥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对立。他认为，动物心理学虽然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内，但它研究的却是动物的行动。其次，波兰尼认为，评价作为一种个体性的协同因素，是贯穿于一切科学研究之中的。任何一种个体认识的行动，都确立了卓越的标准（standards of excellence），以此来评价它所认识的对象。所以，“和通常所接受的意见相反，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分支，都作某种类型的价值判断。任何分支都鉴别构成其主题的特定的综合体，相应的卓越的标准构成了连续上升的序列，这个序列的顶点是对人类行动的道德评价。”^{[4]（P80）}结晶学是精密科学中的评价实践的典型例证^{[5]（P43-48）}，它就建立在用卓越的标准来评价各种各样的晶体的活动的基础之上。同样，在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动物心理学等学科中，科学家都把相应的标准应用到不同层次的生物上。对人类行动的道德判断，只是在这个上升的序列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评价形式。第三，默会知识论认为，通过寓居而认识是普遍的。“没有一种关于自然的知识，不以某种程度的观察者寓居于其主题之中为前提，这种寓居的密切程度表现为一个连续进展的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最充分和最恰当的寓居，被正当地视为是历史学家的特有的方法。”

^{[4]（P80）}因此，波兰尼认为，当狄尔泰和立普斯主张只有通过寓居才能认识人类以及艺术品时，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将寓居和观察相对立，进而认为这一事实构成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界线时，他们是错误的。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差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观察一个恒星时寓居的程度没有理解人和艺术品时的寓居那么深。默会认识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连续性的过渡。”^{[2]（P160）}

值得注意的是，当脱离主义者试图界分历史和自然科学时，他们采取了“通常所接受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无视自然科学中的评价和寓居。显然，这种“通常所接受的”科学观，正是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在此，我们面临着一种吊诡的情形。一方面，脱离主义者界分史学和自然科学，其动机是要挑战实证主义的科学帝国主义，质疑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统一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纲领，因此，脱离主义运动的本意是反实证主义的；另一方面，史学和自然科学相脱离的主张本身，却是建立在认同、接受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理解之上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对现代心灵的影响之深之巨。

脱离主义者第二个论据强调的是历史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和自然现象的重复性之间的对立。这个观点，首先是由文德尔班在《历史和自然科学》的著名讲演中明确地提出来的。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旨在把握普遍规律，追求制定法则的知识，而历史科学则旨在描述一次性、无双性的事件，追求描述特征的知识。波兰尼承认科学研究中的这两种进路的差异，但否认这种差异会导致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离。他把这两种研究进路分别称为

理论的和事实的，认为它们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知识之中。波兰尼指出，独一无二性和重复性的比例关系在不同的科学中是不同的，它们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史学的特点在于事实的兴趣相对于理论的兴趣占优势地位，而在自然科学中，情形刚好相反。因此，从数理物理学一直到历史研究，存在着一个科学的连续的等级序列，其中，独一无二的特征和一般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比例”^{[4] (P83)}

脱离主义者的第三个论据是理由和原因之间的对立，即历史学家要把握人的负责的行动的理由，而自然科学家只能说明自然的现象的原因。波兰尼承认理由和原因的区别很重要，但是他试图在层级化实在的本体论的基础上来重新解释这对范畴，其结果使得史学和自然科学相分离的主张难以立足。波兰尼认为，理由和原因的差别，“是在较高层次上起作用的综合性原理和属于较低层次的诸细节的各种作用之间的差别”。^{[4] (P91)} 如上所述，在宇宙的等级结构中，综合体构成了存在的较高层次，而诸细节则属于较低层次。对于较高层次的存在，我们既可以谈论其运作成功的理由，也可以谈论其失败的原因，而失败的原因只能用较低层次的诸细节来说明。在此意义上，波兰尼认为，我们既可以合理地谈论自然界所有生命体（甚至机器⁴）成功运作的理由，同时，也可以谈论人的合理行动失败的原因。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对于宇宙间不同层次的存在的原因和理由的探讨，构成了一个连续体。

总结波兰尼对脱离主义运动的批评，可以看到，上述三方面的论辩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即自然科学和史学的连续性。波兰尼说，他的立场，“否定自然研究和人的研究之间的非连续性。它主张，所有的知识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知识在所有存在的层次上都是同类的。但是，这一立场同时也承认，当我们的理解的主题上升至更高的存在的层次时，当它展示了新的综合的特征时，对它们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解力。因此，我将欣然承认，历史学家必须运用一种特别的理解力。但我也主张，历史学家的方法的所有特点，是在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不断修改的连续过程中产生的。当科学家逐渐地从对无机自然的研究进展到对生命的研究，首先是对低级的生命形态的研究，然后是对较高级的生命形态的研究，最后上升到对高等动物的智力的研究，在此过程中，越来越高级的理解形式开始发生作用，人的研究只是在这个序列中再增加了一个更高级的理解形式。因此，史学的特点是从一个发展的连续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广泛地预示了这种发展。”^{[4] (P73)} 这是波兰尼立足于其默会的、个体的知识论和层级化实在的本体论，对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连续性学说的简明扼要的表述。

但是，正如波兰尼指出的那样，“连续性不排除根本性的区别”^{[3] (P122)}。在他的晚年，波兰尼在默会知识论的基础上，在科学和人文的连续性的框架内，深入地探讨了科学意义（scientific meaning，即在科学中所获得的意义）和人文意义（humanistic meaning，即体现在象征、隐喻、艺术品、神话和宗教等文化形式中的意义）之间的区别。按笔者的概括，波兰尼主要围绕着想象力（imagination）、形式化的模式（formal pattern）和意义（meaning）这三个方面，探讨了两类意义的差异。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不能对波兰尼在这方面的研究作充分的论述，只能简要地概述如下。波兰尼认为，虽然科学发现需要极大的想象力，但是一旦发现完成之后，对科学知识的接受和利用就不需要太大的想象力，与此不同，对于艺术品而言，其创作和欣赏都需要发挥极大的想象力。艺

术、神话、宗教都有形式化的模式，这种人为的框架使它们远离我们的世俗生活和日常关切，获得一种超自然的意义，不同于我们在日常知觉和自然科学中所获得的自然意义。在科学意义是指示（indication）类型的，人文意义是象征（symbolization）类型的，是“献出自我的”，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当我们身处宗教的礼仪中时，我们会充满感情地交付我们自己，被它们裹挟而去。^[3]

总之，波兰尼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反思包括了两个步骤：首先，克服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假想的鸿沟，确立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其次，在连续性的框架内，探讨了科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波兰尼对斯诺问题的回应。

结语

总结本文的讨论，不难看出，贯穿于波兰尼对科学和人文关系的反思的，是他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联系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争，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参与者视角的主导性

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之间的假想的鸿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视角的二元论（dualism of perspectives）。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条件下，“随着在方法论上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外（outside）和内（inside）的视角差异也发展起来了。对于追求自然法则的经验科学来说，只有以观察为基础的客观化的研究自然的进路，才被认为是前途的，而诠释科学只有采取交往中的参与者的施为态度（performative attitude），才能通达历史文化。对象领域的分裂，相应于如下这种情况，即在自然科学中赋予观察者的视角以特殊地位，而在人文科学中，赋予参与者的视角以特殊地位。”^{[7]（P35-36）}波兰尼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对个体的参与、寓居的普遍性的强调，粉碎了这种视角二元论，并且在所有的人类探究中，确立起了参与者视角的支配地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异不在于前者是观察的，后者是介入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都是参与的，两者的差异是在参与者的视角中的差异。波兰尼晚年立足于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对于意义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两类意义，即在日常知觉和自然科学中的意义和体现在艺术、神话和宗教中的意义之区别的探讨，正是旨在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阐明科学和人文的差异。波兰尼晚年哲学探索的意义就在于此。

2、“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

和波兰尼将参与者的视角引入对自然科学的分析密切相关的，用伯恩斯坦的术语来说，是他对“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伯恩斯坦在其《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中认为，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他以库恩的科学哲学为例对此作了阐明。在笔者看来，波兰尼的科学哲学也十分契合这一范畴，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指向了这一点。如上所述，他曾明确地指出自己的通过寓居而认识的主张和狄尔泰的哲学的联系，并且强调他和狄尔泰的不同在于他把寓居的观念推广到了对自然科学的分析之上。他用默会能力来诠释理解，强调理解的重要性，把它视为认识的终极能力。他对理解中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讨论，为我们理解解释学循环提供了新的视

角。此外，他对近代批判哲学的普遍怀疑原则的批判⁵，和伽达默尔对启蒙运动反对一切先见的先见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信托纲领（fiduciary program）揭示了所有合理性的信念根源，和伽达默尔的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先见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克服了批判哲学对权威和传统的敌意，明确主张传统和权威对于科学研究是构成性的，这一点也类似于伽达默尔为传统和权威正名的努力。在揭示波兰尼的思想和诠释学家的思想的相似性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和后者主要是对精神科学加以反思的结果不同，前者主要是反思自然科学的结果。笔者相信，充分地阐明波兰尼科学哲学中的诠释学内容，必将对伯恩斯坦的主张给予有力的支持，而且能够丰富这一主张的内涵。

3、建设性地运用海德格尔的“在世”（being-in-the-world）思想

在时下的精神氛围中，拒斥认识论的思潮风头正健。从笛卡尔开始，中经洛克、康德，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哲学传统中得到继承发展的整个认识论的传统，成了攻击的对象。到处都可以听到诸如“认识论的终结”、“认识论的危机”、“认识论的克服”等等的谈论。问题是，在此背景之下，如何看待波兰尼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

近代认识论传统把知识理解为表象，用罗蒂话说来，“认识就是精确地表象心外之物。”^{[12] (P3)} 这种关于知识的表象式的构想（representational construal of knowledge）成了象罗蒂、泰勒这样的认识论的终结者攻击的重要目标。泰勒认为，知识的表象模式的缺点之一是孤立性（disengagement）。^{[13] (P1-19)} 表象的知识观，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实质上是把知识理解为一个孤立的（disengaged）主体和一个现成在手（present-at-hand）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泰勒认为，海德格尔对“在世”的著名分析表明，人“首先和主要地”是和当下上手（ready-to-hand）的事物打交道的行动者，这一点，彻底瓦解了关于知识的表象式的构想。在此，泰勒利用海德格尔的“在世”分析，解构了近代的认识论传统。从认识论的立场来看，可以把对“在世”分析的这一运用，称作消极的、否定性的。

在波兰尼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中，我们看到了对海德格尔的“在世”分析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运用。在波兰尼看来，寓居不仅是一种认识的途径，而且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种寓居是我们对我们所理解的对象的存在的参与，它就是海德格尔的在世。”⁶ 每一次我们寓居于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的细节之中，每一次我们寓居于物理的工具之中，每一次我们寓居于理智的工具——比如我们的名言文化中的各种解释框架——之中，我们的存在就要历经某种变化。“寓居就是在世。每一个默会认识的行动，都会改变我们的存在，限定我们对世界的介入，给我们对世界的参与以新的方向。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其他的名目下已经探讨了这些过程，现在，我们必须用更为具体的默会认识的结构，来重新诠释这些观察。”⁶

这就是波兰尼对海德格尔的“在世”分析的运用，它展示了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的认识论的潜质。建立在孤立性（disengagement）和超然性（detachment）基础上的传统认识论当然应该克服。但是，这不是认识论的终结。知识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富有吸引力。所需要的是研究的视角和进路的转换。起码，波兰尼的默会的、个体的认识论摊开了一种可能性。

由波兰尼首先揭橥的这种新的认识论的可能性，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蕴。自从波兰尼于1958年提出“默会知识”的术语以来，围绕着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文献。默会认识论的研究已经渗透到了不同的哲学分支学科，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

和法哲学等，还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如现象学传统、解释学传统、后期维特根斯坦传统以及波兰尼传统等。随着研究的展开，默会认识论的理论潜力正逐渐地得以展现，本文的讨论表明，立足于这种新的认识论，我们可以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这个近代以来一直困惑着人们的问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C.P. 斯诺. 两种文化 [M], 纪树立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4.
- [2] 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M], Routledge, 1969.
- [3] Michael Polanyi and Harry Prosch: *Meaning*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25.
- [4]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72.
- [5]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M], p. vii.
- [6] Putnam. Why Reason Can't Be Naturalized?, in *After Philosophy--End or Transformation?* [J]. ed. by Kenneth Baynes, James Bohman, and Thomas McCarth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 228.
- [7]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139.
- [8] Michael Polanyi. Logic and Psycholog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3), 1968. 27-43.
- [9] Michael Polanyi. *Scientific Thoughts and Social Reality* [M], 142.
- [10] Michael Polanyi. *Tacit Dimension*, Peter Smith, Gloucester, Mass.
- [11] Hermut Kuhn. Personal Knowledge and the Cri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J]. *Intellect and Hope*, ed. by Thomas A. Longford and William H. Potea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9-135.
- [12]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M]. Basil Blackwell, 1980. 3.
- [13] Charles Taylor. Overcoming Epistemology [A].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9.

注释

1. Michael Polanyi: *Scientific Thought and Social Reality: Essays by Michael Polanyi*, ed. by Fred Schartz,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p. 143. 此处所谓“非伦理的”，是指社会学家在说明各种社会行动时，是不问其好坏的。波兰尼认为，这实质上是否认了道德动机在人类行动中的作用。在“Polanyi's Logic--Answer”一文中，波兰尼从逻辑上对此作了证明。参见 Michael Polanyi: *Society,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T. Alle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7, pp. 345-346.
2. 参见, Hermut Kuhn: “Personal Knowledge and the Cri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Intellect and Hope*, ed. by Thomas A. Longford and William H. Potea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09-135.
3. 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p. 156. 在 *The Study of Man* 的 “Bibliographical Note” 中，波兰尼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阐明了他和狄尔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参见, *The Study of Man*, p. 102.
4. 波兰尼在批判还原论时，十分重视对机器作哲学分析。在他看来，一台机器成功运作的理由不能用物理、化学的规律来说明，而必须用它自身的操作原理来说明。操作原理要发生作用得依赖于物理、化学的规律，用它们可以说明机器运作失败甚至毁坏的原因。
5. 在波兰尼那里，“批判哲学”这个词，不象通常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专指康德哲学，而是指笛卡尔以来的那种贬斥信仰、传统、权威，推崇批判、怀疑的整个哲学倾向。
6.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Harper & Row, New York, 1964, p. x. 在 *Personal Knowledge* Harper Torchbook 版中，Polanyi 写了一个新的序，此处的引文即出自此序。
7. 同上., p. xi.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tism and hum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Polanyi's response to "Snow's Problem"

Yu Zhe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Michael Polanyi responds to Snow's Problem in a unique way. His strategy transcend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positivism and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 (including hermeneuticians and neo-Kantians). He overcomes the supposed gap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an and establishes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m. However, continuity does not preclud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s. In his later years, he investigate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scientific meanings and humanistic meaning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Polanyi's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demonstrate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the recovery of the hermeneutic dimension of science and a constructive use of Heidegger's "being-in-the-world".

Key words: 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continuity and distinction.

收稿日期: 2003-08

作者简介: 郁振华, 男, 上海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